

1 导 论

产业分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产业重组的过程。某种状态的产业结构，无非是各种产业载体在分化与重组过程中所形成的产业关联状态及其空间存在形式。无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总构成产业分化与重组的一般基础。由于经济的、自然的和技术的原因，产业关系的不断整合，既延长了产业链条，又优化了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并使传统的、功能残缺的区域性产业体系逐步溶入最广泛的产业社会化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

1.1 对产业和产业结构分类的说明

理论上如何对产业进行分类，完全取决于研究产业结构的具体目的。迄今为止大体有六种分类法：三次产业分类、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霍夫曼工业化标准分类、工业结构分类、资源集约度分类和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分类法。

先后由阿·费歇尔(A. Fisher)、柯林·克拉克(C. Clark)和库茨涅兹(S. Kuznets)提出、论证和深化普及的三次产业分类法适用于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三次产业相关变动的内在关联机制，反映一定时期的工业化水平，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分类法。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是对三次产业分类法的扩展和具体化，其无

所不包的特点更适用于研究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联效应，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的基本轨迹。霍夫曼工业化标准分类法将全部产业分为消费品产业、资本品产业和这两者以外的其他产业（如印刷、造纸、橡胶等中性产业），有利于衡量一定时点上的工业化水平，划分工业化阶段。工业结构分类法将工业本身分为重工业和轻工业两部分，旨在分析社会资源如何在两者之间作重心转移，以显示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资源集约度分类法旨在根据不同产业吸纳资源能力的差异，寻求宏观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并参照一定时期社会可支配资源的存量与结构，确定产业调整战略和政策。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分类法超越了对产业分工结构的一般描述，而把总量与结构、分工与交易、价值实现与社会需求结构、生产与消费、价值构成与使用价值构成等关系集于一体，用于分析产业结构和社会制度结构对物质资料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和经济关系再生产的影响。与前几种分类法相比，资源集约度分类法的分类标准弹性较大。工业化过程会改变各产业的资源集约型式，比如某一产业由劳动集约型向资本或技术集约型转变，等等。因而，这一分类更富有动态特征。

以上分类的差异，仅体现于研究问题的不同角度。相对于产业结构分析所必需的知识体系而言，每一种分类都各有其长。基于这一考虑，并根据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需要，本书不排斥任何一种分类法，在主要采用三次产业分类法和工业结构分类法的同时，兼及其他分类法，以便于从多侧面揭示我国产业结构形成与转换的内在机理。另外，国际上对三次产业所属部门的确定尚有差异，本书根据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划分三次产业的标准和范围，划定三次产业的口径：农业为第一次产业，包括种植业、畜牧业、狩猎业、林业和渔业；工业为第二次产业，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煤气、电力和自来水生产；服务业为第三次产业，包括交通运输、通讯、仓储、批发和零售商业、外贸、金融、房地产、科学、教

育、新闻、公共行政、国防、社会事务、娱乐和个人服务。

产业由分化而重组，恰如劳动因分工而协作一样，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扩展为关系复杂的产业体系。所谓产业结构也就是这一体系的一种存在形式。某一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的产业水平，集中体现于产业体系的结构水平或结构功能，它不仅表明各相关产业已经达到的统计学意义上的量化成果，而且表明各相关产业之间的社会化联系程度、未来发展潜力、方向和反映产业组织功能的产业规模效益。据此，产业结构应可进一步定义为产业之间与产业内部的社会组合关系和产业体系的整体功能状态。反映这种关系和功能状态的是产业分工结构、产业关联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对于大国体系来说，产业分工结构水平在较大程度上表现于区域分工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普遍重视产业政策研究，产业结构理论也随之逐步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但是，由于研究问题的侧面和方法各异，对产业结构的范畴界定和分类缺乏相对一致的规范。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创始人之一、美国经济学家贝恩(J. S. Bain)在《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一书中所讨论的“产业结构”实际上是指产业内部的企业结构。他在后来出版的《产业组织》一书中索性以“产业组织”代替企业结构从而代替产业结构。对产业结构研究较早较多的日本产业理论界，明确地把产业结构界定为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但对产业结构的分类也很不统一。有的认为产业结构应包括产业分工结构和产业关联结构，有的则认为产业组织结构也属产业结构的范围。其实，作为产业体系存在方式和功能状态的产业结构，只有涵盖产业分工结构、关联结构和组织结构，其意义才完整，至于在具体研究中侧重于某一项或某几项，抑或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舍去其中某一项，这只是方法问题。本书对产业结构的分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为使分析框架在逻辑上更紧凑，与中国的现实更贴切，作者有意识地舍去产业组织结构。因为现存的产

业组织并不具有原则意义上的“结构”内涵，原则意义上的产业组织结构实质上是市场组织结构在产业体系中的表现形式，而迄今为止，这种意义上的产业组织在中国并未形成，起码在广大内陆地区尚未形成功能完整的独立形式。中国需要在市场基础上构筑并完善现代产业组织结构，实现产业组织革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只能留待于一项更专门的后续研究去完成。

1.2 产业结构转换机制

现实产业结构的形成包括一系列结构转换过程。产业结构转换机制是指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各相关变量的联动关系、结构功能及其变动。由于自然禀赋条件、体制环境、发展模式和人文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各国和各地区几乎不存在统一的产业结构转换机制，但是，总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因素，使产业结构转换过程带有某些常规的趋势性特征。这些因素主要包括：需求结构的收入弹性、生产结构的要素供给弹性、社会总需求结构对部门增长格局的影响、需求收入弹性、技术进步与产业关联效应的双向传导、适应规模经济的产业重组等。

(1) 需求结构的收入弹性。需求结构的收入弹性，不是指某种产品的需求变动速率与收入水平变动速率的关系，而是指需求结构变动对收入水平变动的长期反应趋势。“需求层次论”对于需求结构与收入水平正相关变动的经验估计，符合人类需求体系的重心由生存向发展转移的一般规律。但作为产业体系的一个环节，需求结构的收入弹性最终总表现为产业结构变动对人均收入水平变动的反应。世界各国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工业化过程，都无例外地存在着这种反应特性。“配第-克拉克定理”关于比较利益差别引起资源在产业间转移的经验判断，已经把收入水平变动对需求结

构，进而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弹性作为前提予以设定，即，收入水平提高刺激需求体系的分化和产业分化，引起产业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利益差别，最终促使资源由基本生存资料生产领域的农业，向加工程度较高的综合性生产领域转移，适应这种产业重心转移的服务业，也逐步从农业和工业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产业部门。三次产业的形成，首先是需求结构、需求层次随收入水平变动而变动的客观结果。美国经济学家 H·钱纳里(H. Chenery)^①通过对不同样本国家工业化时序比较和截面比较，也证实了需求结构，从而产业结构对收入水平变动的反应弹性（见表 1-1）。

表 1-1 需求结构与收入水平相关变动趋势

收入水平 (人均美元)	需求结构(占总需求比重%)			
	农业初级产品	工业消费品	社会基础设施	服务业
140	18	8	14	40
560	8	10	18	42
2 100	3	10	20	42

资料来源 据 H·钱纳里、S·鲁宾逊、M·赛尔奎因合著：《工业化与经济增长比较研究》表 3-4、表 3-5、表 3-6 整理计算。

(2) 生产结构的要素供给弹性。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根据投入产出关系 将社会生产分为七大类 基础材料、加工机械、生活消费品、建筑、商业、服务、其他（指电气、供水、金融、运输、通讯、农林水产等）。要素供给条件对各类生产，从而对社会再生产中投入产出关系的影响程度，就是生产结构的要素供给弹性。

要素供给条件（包括潜在供给总量和供给结构）对生产结构的影响有几种不同情形。其一，供给条件的结构性短缺，迫使生产结

① 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比较研究》中译本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年版。

构服从“短边规则”^①，保持低水平均衡。东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资本和技术短缺所出现的“短边规则”下的低水平均衡，恰属这种情形。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中，“短边规则”不可能长期存在，贸易结构调整和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可以实现要素供给结构的有效均衡，优化再生产体系的结构功能。其二 基础产品的总量和结构都无力支撑制造业的发展，迫使产业体系向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运输业倾斜，形成贸易主导型产业结构。日本是这种情形的典型。迫于自然资源贫乏的现实，日本在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即开始实行结构性的贸易主导型发展战略——以造船工业的加速发展，带动运输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调整传统的以纺织品为主的出口结构；运输业，尤其是远海运输业的加速发展，拓宽了自然资源的供应渠道，国外廉价资源成为日本制造业发展的基础；国际贸易和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业、服务业的发展，带动生产结构向高加工度演进，加速劳动力向第二、第三次产业转移。其三，要素的产出水平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差异，引起再生产循环以要素生产率水平高的部门为核心，重新组合生产结构，调整国民收入使用额和劳动力的分布格局。这种从市场角度看纯属自然的情形可能导致两种极端的效果。一极是：要素转移加速低效率、低技术构成部门的衰落和新兴的具有比较利益优势部门的扩展，带动国民经济部门结构的总体水平上升，扩大产业体系的技术容量。另一极是：要素转移受短期利益驱动，加剧生产结构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基础性中间投入品生产部门在不平衡增长格局中的日益衰萎，会导致经济体系的潜在增长能力下降，即所谓“无发展的增长”。南美洲多数国家印度和中国在结构转换中都曾出现过这种极端的情形。

① 设想一下木工制作木桶的例子。如果只有 15 块木板，其中一块短于另外 14 块，在既不能寻求替代，也不能缩小底半径条件下，不得不以短板为标准，调整另外 14 块的长度。这种由短边约束资源使用效率的规则就是“短边规则”。

(3) 社会总需求结构对部门增长格局的影响。这里讨论的社会总需求结构主要指最终需求与中间需求的比例关系，以及两者的内部比例关系。最终需求包括个人消费和使用、设备投资、增加库存、出口、政府购买、与各项相关的劳务。中间需求指由再生产过程和再加工程序产生的对一次使用就将其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投入品和劳务的需求。社会总需求结构的部门增长效应就是指不同生产部门对社会总需求结构变动的反应弹性。

从各国工业化常规进程中的结构转换趋势看，部门内部的技术进步、生产过程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再加工程序的深化，使总产出中的更大份额成为中间投入品，而非最终消费品。这意味着，分工范围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部门结构更加细化，交易规模相应扩大。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V. Bohm-Bawerk）认为这是产业体系发展的正常趋势。钱纳里在分析多国模型结构转换时期中间需求增加同制造业份额增加的关系之后，却无意识地得出另一结论——工业化来自制造业份额的增加，而制造业份额增加的原因在于中间需求份额的大幅度增加。他以此否定人们公认的工业化主要导源于“恩格尔效应”的观点。其实只要弄清楚社会需求结构对部门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式，问题可能就较为明朗了。

首先，对于常规运行的社会生产体系来说，中间需求总量的增加，取决于最终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变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社会总需求的扩张。工业化进程造就了庞大的机器体系，使设备投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增大，即国民收入的更大份额用于满足最终投资需求，进而客观地刺激中间需求扩张，并扩大中间产品的技术容量，传统的以初级产品和初加工产品为主的中间投入品为技术含量较大的成品或半成品所取代。简言之，受“恩格尔效应”影响的社会总需求扩张，通过刺激设备投资，间接地刺激中

① H·钱纳里：《工业化与经济增长比较研究》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间产品生产部门的迅速增长。这种由最终需求到社会总需求，再到中间需求的传导过程，反映了工业化常规进程中部门增长的动态特征。至于在相对水平或增长指数上中间需求高于最终需求，只表明制造业投资乘数更大，扩大了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而不表明制造业增长的源泉在于中间需求的扩大。

其次，对于非常规运行的社会生产体系来说，中间需求的过度扩张，可能因为物质消耗系数过大，部门结构畸轻畸重，并不代表有效经济增长对中间产品的实际需求。在此情形下，根据需求信号增加中间投入品生产，只会加剧产业体系失衡，限制产业体系的有效增长和技术进步，维持低效益的数量循环。

各国经济增长水平与产业结构水平相关变动的实践表明，产业结构变动最快的时期一般伴随着高速增长。这种近乎必然的联系恰恰体现在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上。由最终需求拉动，并与结构变动处在同一过程的经济增长，一般不致于引起超常规经济波动，相反，有助于加速产业进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得助于最终需求体系的拉动作用，尤其是出口需求、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需求的迅速扩张，彻底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服务于战争的部门结构和生产结构，扩大了技术进步的空间。

(4) 需求收入弹性、技术进步与产业关联效应双向传导。经济发展或产业进步的明显特征是产业关联效应的放大，并伴随着主导产业乃至整个产业关联体系的更新。自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W. Leontief)的《投入产出经济学》^①出版以来，产业理论界已经就产业关联结构及其变动作了大量统计实证。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是：导致产业关联结构变动的是何种内在力量，各相关变量又是如

^① W·列昂惕夫：《投入产出经济学》中译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年版。

何传导的？

钱纳里等人曾根据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挪威等国的投入产出表，对所有产业的关联特征作了静态分类（见表 1-2）。

表 1-2 产业关联特征的静态分类

	中间需求率小	中间需求率大
中间投入率大	<p>Ⅲ 最终需求型产业</p> <p>日用杂货、造船、皮革及皮革制品、食品加工、粮食加工、运输设备、机械、木材、木材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其他。</p>	<p>Ⅱ 中间需求率大</p> <p>钢铁、纸及纸制品、石油产品、有色金属冶炼、化学、煤炭加工、橡胶制品、纺织、印刷出版、其他。</p>
中间投入率小	<p>Ⅳ 最终需求型基础产业</p> <p>A 渔业</p> <p>B 运输、商业、服务业。</p>	<p>I 中间产品型基础产业</p> <p>农业、林业、煤炭、金属采矿、石油天然气、非金属矿、电力。</p>

对表 1-2 中四类产业作直观静态比较可以发现，第Ⅱ类产业的中间投入率与中间需求率均居首位，产业关联效应最强，具备主导产业的特性。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也曾从多国增长模型的统计分析中得出类似结论：中间产品需求的扩张是产业结构转换的动因。从统计量之间的关系看，这个结论无疑是对的。但是诚如前面曾经指出的，中间产品需求的扩张只是最终需求结构变动和总量扩张的表现，单是从中间产品在产业体系中的关联特性出发，难以说明产业结构，尤其难以说明产业关联结构转换的内在机制。与产业关联结构变动直接相关的变量及其传导机制，比中间产品需求扩张所能说明的问题要复杂得多。

最终需求是人均收入水平的直接函数，中间需求是人均收入水平的间接函数，这是理解产业关联结构及其转换机制的关键。产

① 转引自宫泽健一：《日本的经济循环》，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168 页。

业经济学家共同遵循或基本认同的关于人均收入水平与产业高度正相关的论点，无非表明下列可由统计量证实的事实：

恩格尔系数（饮食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是个人收入水平的减函数；

霍夫曼比例（消费品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是收入水平的减函数；

重工业化率是国民收入水平的增函数；等等。

问题恰恰是由这些可由统计量证实的事实引出的——这些标志产业进步的外在事实只不过是产业关联结构变动或产业体系变迁的表现形式，那末，决定这一变迁过程的是哪些主导变量？各种变量的相关效应又是如何传导的？

历史地考察各国产业关联结构转换的一般机制，撇开由于条件差异而产生的异常情况和对于一般机制分析意义不大的随机变量，似可选定五个主导变量：人均收入水平、最终需求、技术进步水平、中间需求、产业关联效应。其传导过程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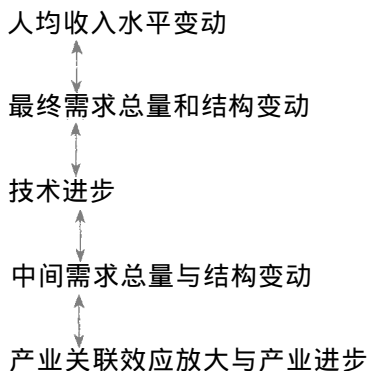


图 1-1 主导变量的传导过程

以上变量传导机制的主要特点是：变量关系都是可逆的，由人均收入水平制约的最终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动，会引起原有产业体系的均衡结构趋于解体。要确立新的均衡结构，除了政府调整贸易

战略和宏观政策外，最主要的，也是各国普遍采取的手段，就是加速技术进步·促进产品开发。技术进步的物质基础是占最终需求比重最大的设备投资，而与设备投资扩张具有互补性质的是中间需求加速扩张。这一系列变量传导效应最终表现为存量体系重新整合和产业进步，也是产业经济学家所公认的结局：制造业在产业体系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产业关联结构被新的向重工业倾斜的产业关联结构所取代，即所谓“重工业化率”上升推动产业进步。“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与以上变量传导过程大体一致。

主导变量的正向传导，给出结构转换的基本轮廓，但实际传导过程是正向传导与逆向传导的统一产业关联效应放大和产业进步，在客观上又会刺激中间需求扩张，即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优先增长^①，霍夫曼比率下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打破旧的技术结构，扩大产业体系的技术容量。作为结果的技术进步，不仅推动中间产品生产与需求的扩张，而且也必然带动最终需求型产业的扩张和结构变动。

主导变量的双向传导，使结构转换既表现为连续的经济发展过程（不排斥跳跃式发展的阶段性和非常规经济波动引起的非常规存量变动），又表现为多因素相互递推的结果，这才是产业体系变迁的常态特征。日本、美国和前联邦德国等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曾出现的制造业部门向重工业倾斜的事实，并非导源于制造业内部中间需求型产业的自然扩张，而是由于收入水平和最终需求的联动作用，刺激最终需求型产业发生大规模的增量变动，进而带动中间需求型产业扩大存量体系，并在技术进步的联动作用下向技

① 库茨涅兹根据美国资本品生产长期基本稳定的事实，否定霍夫曼比率的真实性。其实，美国资本品生产相对稳定只是在工业化完成后才出现的从经济发展一般趋势看，霍夫曼比率的存是在普遍真实的。

术容量大的重工业倾斜。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最终需求型产业的边界被收入增加累积起来的总需求效应所突破，属于并依赖于重化工业的产业有很大一部分归入最终需求型产业，如各种家用电器和电气设备等。把产业结构变动归因于中间需求型产业的自我扩张，显然是违背产业关联特征的，从各国经济发展实践看，只有在收入水平对总需求失去弹性，中央计划对资源具有直接调配功能时，才会出现中间需求自我扩张拉动结构转换的局面（这在以后还将作具体分析）。

(5) 适应规模经济要求的产业重组。为追求规模经济而实行产业重组，是交易与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从英国经济学家 A·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将“组织”也列为生产要素以来，与规模经济要求相适应的产业组织理论逐步发展为独立的以市场组织为对象的研究领域。前面已经说明，本书不单独考察产业结构，凡涉及产业重组问题，仅限于产业规模变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凡要素组合，必有结构功能。优化结构体系的要素组合，其产出功能肯定大于简单的要素相加或相减。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Q = AL^\alpha K^{1-\alpha} e^{pt}$ 是分析要素增减及其结构变动对产出水平变动影响程度的基本工具。但是，方程本身并未包含产业规模对产出水平的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都是离散的。要分析产业规模变动对产业水平的影响，必须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加以扩展。

原函数中 Q 是产出水平，即要素供给函数， L 为劳动投入， K 为资本投入， A 为要素比例常数， α 和 $1-\alpha$ 分别为要素 L 和 K 的产出弹性， p 为技术产出弹性，并且 $A > 0, p > 0, 0 < \alpha < 1, e$ 为技术进步水平，随时间 t 的变动而变动。

现对原函数加以扩展，设之为 r 次齐次函数，则对应于任意大

① A·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 1964、1965 年版。

于 1 的常数 A 都有：

$$f(Aa_1, Aa_2, \dots, Aa_n) = A^r f(a_1, a_2, \dots, a_n) \quad (1)$$

于是，原函数变成：

$$Q = A^r L^\alpha K^{1-\alpha} e^{rt}$$

当 $r > 1$ 规模效益递增；

$r = 1$ 规模效益不变；

$r < 1$ ，规模效益递减，表明要素结构失衡，边际投资收入率小于零。也可能表明产业的技术容量已达极限，增量变动引起要素结构失衡，降低了要素产出弹性。

把扩展了的生产函数所包含的结构涵义纳入对产业结构变动过程的考察，便可发现产业规模变动不仅影响要素产出水平，更重要的是以规模效应刺激产业体系按规模经济的要求重新组合。

表 1-3 美国公司结构变动

最大公司数	最大公司比重(%)			
	1947	1954	1958	1963
50	17	23	23	25
100	23	30	30	33
150	27	34	35	37
200	30	37	38	41

资料来源：转自布·明兹著：《现代资本主义》中译本 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70 页。

规模经济不仅仅产生于规模的扩大，也可以产生于规模的缩小。产业发展的具体过程是趋向于规模扩大，还是趋向于规模缩小，主要取决于产业本身的经济、技术特性和各国的产业组织政策取向。表 1-3 和表 1-4 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情形。西方企业规模变动的总体趋势是规模增大，但在某些部门和行业，规模缩小也属常态。作为趋势 企业规模的扩大 主要有资本积聚、企业联合和企业合并三种形式，但真正对产业结构总体变动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后

两种形式，因为这两者既是生产社会化的结果，又代表了生产社会化的未来趋势，并更多地反映了规模经济的内在要求。

表 1-4 日本、前联邦德国、意大利企业结构(70年代末)

国别	中小企业数	占企业数比重	占就业数比重	占总产值比重
日本	620 多万	99.4	75.5	50%左右
前联邦德国	160 多万 (9 人以下)	85		约 2/3
意大利	100 多万	99	97.3	66.7%

资料来源 转自曹旭华等编：《比较经济发展》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169 页。

适应规模经济要求的产业重组与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动，有着共同的倾向，即，随加工层次的深化，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向技术容量大的制造业部门集中，至于各国产业重心具体落在制造业的哪些分类产业上，则取决于各国的资源结构、技术进步水平、农业的扩张与分化速度和产业政策导向。但有一点必须明确：这种倾向性的存在和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配置体系常规运行的体制基础。在市场的或非市场的（哪怕是准市场的）体制基础上，产业关联体系中的变量传导机制截然不同。本书第七章将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1.3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结构转换

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结构转换，结构转换的速度反映工业化速度，产业高度与收入水平直接相关。现代产业理论和发展理论研究者大多循着这样的思维逻辑构筑理论框架。就经济发展中各主导变量的一般传导程式而言，这一框架是正确的，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转换问题，结构转换的目标是产业高度化，其赖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当然包括一定的收入水平，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事

实。然而 在经济发展、结构转换和工业化的相关体系中 经济增长应被置于何种地位，它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产业结构转换？对此，人们或者避而远之、或者偶然涉及其范畴的边缘。

把经济增长置于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的相关体系之外的研究传统，导源于这样的理论逻辑：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的实用领域是不发达国家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相关变动的长期趋势，经济增长研究的实用领域仅限于发达国家在完成经济起飞后国民生产总值持续稳定增长条件和短期增长水平。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C. P. Kindleberger）认为，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包括投资增长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长和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引起的产量增长；经济发展既包括更多的产出，也包括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体制变革与技术进步，“正如人类身体 强调增长着眼于身高和体重 或者说国民生产总值）强调发展则着眼于机能——综合素质的变化”^①。美国另一些经济学家如 M·吉利斯、D·H·帕金斯等认为：“经济增长指国民收入或人均收入与国民产值的提高。如果一国的产品生产或劳务增加 无论其得自何种手段 即可称之为经济增长”^②。经济发展，包括人均收入提高以外，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其中两个最重要的结构变化是工业在国民产值中的份额上升（农业份额下降）和城市居住人口的百分比增加。另外，处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一般都经历人口增长由加速到减速的时期，其间，国民的年龄结构变化显著，消费模式也发生变化，不再把全部收入用于基本必需品，而是向耐用消费品和娱乐产品与劳务转换”^②。他们的共同倾向是不考虑经济增长对结构变动的影响，尽管都正确地把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甚至吉利斯和帕金斯等已

① C·P·金德尔伯格等：《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5—6 页。
M. Gillis, D. H. Perkins, Michael Roemer, D. R. Snodgrass;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PP7—8,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3.

经意识到经济增长必然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他们忽视或者轻视了这样的问题：经济增长（按西方学者的定义）所涉及的主要是微观变量及其传导机制，经济发展所涉及的主要是宏观变量与参数及其传导机制，这两种变量体系是如何相互传导的？把宏观变量与微观变量以及各自的传导机制置于两张皮上，那么，宏观变量的传导以何为微观基础，微观变量又借助于何种机制实现其传导效应的宏观化（结构转换说到底就是微观变量宏观化）？

现代产业理论的成功与不足皆系于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动相互传导机制的把握程度。如果对产业结构作静态假设，考察经济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等于说经济增长对结构变动是非弹性的，微观变量可以超越结构变动的传导过程而直接实现宏观化。这种情形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存在。短期内的存量均衡可以维持暂时的均衡增长，但即使是均衡增长，最终也会突破既定的存量均衡格局，引起适应性结构变动或结构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一段黄金时期的均衡增长之后，终于在 60 年代末打破了 50 年代初形成的相对均衡的存量体系，引起 70 年代初的普遍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在此之后的 10 年时间的相对均衡增长，再度于 80 年代末打破了由信息产业、高技术产业所维系的均衡结构。类似的变动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可以找到许多例证。甚至可以说，每一次大的经济波动或大的结构调整都是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相互传导的动态反映，无论结构调整的动因来自经济体系对市场信号的自觉反应，还是政府对未来市场走势的理性判断（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结构调整）。进一步说，回避或忽视经济增长对结构变动的影 响，就无法理解某些国家何以出现经济增长加速主导部门的扩张，强化产业关联效应，实现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统一；而另一些国家何以出现总量扩张下的低速发展，产业关联效应随总量扩张而递减（这种情形以后还将联系中国的实际作更详细的分析）。

1.4 技术进步、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模式与结构变动

在农耕时代，或在以农业为产业本体的国家，由于需求结构变动滞缓、总需求的收入弹性小和产业规模小等因素的强硬制约，技术进步在发展因素中不占主要地位，对产业结构变动的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于提高生产率，加速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转移，实现产业重组的作用，几乎被农业本身的低水平自我循环机制所抵消。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农业本身的自然属性限制了技术容量，对自然的依赖甚于对人工技术的依赖。打破农业长期低水平循环的内在机制，从而降低农业对整个产业结构工业化步伐的钳制力度，显然不能简单地依赖于农业本身的缓慢分化和自然循环，必须借助于农业以外的某种强有力的机制，形成新的需求效应，将农业纳入整体产业的技术进步轨道，加速农业的扩张与分化。西方工业革命终于形成了这样的强有力的机制，农业本身的长期低水平循环机制因大工业造成的新的需求体系和产业关联体系而不复存在，技术进步既成为农业部门在比较利益原则下的自觉实践，又成为农业工业化的最顺畅的通道。

以技术革命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为传统农业提供两条走出低水平循环的途径：一条是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成果，将农业由自然体系改造为人工体系，提高生产率，加速农业内部结构分化和劳动力向第二、第三次产业转移；另一条途径是顺应大工业自我扩张所造成的比较利益差别，按照“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实现产业转移。从趋势上看，这两条途径实际上是殊途同归，即，技术进步引起传统农业分化，加速整个产业体系的结构分化与重组，确立新的产业